

•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

“海湾海盗”:英国对前殖民地时期海湾阿拉伯人的历史叙事与形象建构

黄 民 兴 刘 雪

〔摘 要〕20 世纪初,英国开始了对海湾历史的学术研究。根据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记录,以洛里默为代表的英国东方学者将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海湾阿拉伯人尤其是卡西姆人定性为“海盗”,将他们定居的下海湾沿岸称为“海盗海岸”。这一观点成为 20 世纪海湾历史研究的主流。英国人对前殖民地时期海湾历史的书写具有政策指向性和种族主义叙事的特点。“海湾海盗”形象的建构源于英卡之间的海上矛盾,正在转向自由主义的英帝国以打击“海盗”为契机逐步在海湾建构了“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军事远征“海盗海岸”之后,英国以“保护”的名义开启了对海湾长达 150 年的殖民统治,影响了现代阿联酋的政治和军事防御格局。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英国学者的观点受到阿拉伯学者的质疑,后者重构了前特鲁西尔时代海湾阿拉伯人的形象。

〔关键词〕英帝国;海湾阿拉伯人;海湾海盗;海湾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K091(5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5)05-0091-14

1778—1819 年是中东海湾水域海上劫掠事件频发的时期。从 1797 年起,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和巡洋舰在海湾水域屡次遭到劫掠。海上劫掠事件引起了英国驻印度的殖民政府对海湾海上阿拉伯人的关注,并于 1809—1810 年、1819—1820 年两次军事远征被英国人称为“海盗”的卡西姆人(Qawasim)及其定居地“海盗海岸”。1820 年,英国与海湾诸部落酋长签订“总和平条约”,开始了对海湾的殖民统治。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海盗”问题开启了英国对海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是海湾阿拉伯酋长国历史的转折点,改变了海湾阿拉伯人的历史走向。“海盗”形象的建构是英国殖民统治海湾酋长国、控制海湾制海权的合法性来源,同时也影响了英国在海湾的殖民统治方式。

记载前殖民地时期海湾阿拉伯人活动的原始文献以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和欧洲人的旅行、考查记录为主。除了少量殖民地官员与阿拉伯部落谢赫的通信外,几乎没有与之相关的一手阿拉伯文资料。1904 年,在英印政府外交部的支持下,以约翰·戈登·洛里默(John Gordon Lorimer)为首的政府调研团队历经 10 年,经过对海湾的实地考察和大量的资料整理工作,最终撰写出了海湾历史的奠基之作《波斯湾、阿曼和阿拉伯半岛中部地名词典》(下文简称《地名辞典》)^①。这部著作是英帝国统治海湾的象征,是英帝国官员制定海湾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学者们研究海湾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20 世纪上半叶,研究海湾历史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阿诺德·威尔逊爵士的《波斯湾简史:从远古至 20 世纪初》(以下简称《波斯湾简史》)^②。该书编撰了从史前至 20 世纪初的海湾历史。威尔逊爵士将海湾地区的历史发展视为一个整体,《波斯湾简史》一书可以说是第一部海湾区域史。

二战前,海湾历史的记录者和研究者主要是在殖民地履职的英国公职人员。他们形成的海湾知

① J. G. 洛里默:《波斯湾、阿曼和阿拉伯半岛中部地名辞典》(J. G. Lorimer, *Gazetteer of the Persian Gulf, Oman, and Central Arabia: Historical*) 第 1 卷,加尔各答:政府印务监督办公室 1915 年版;J. G. 洛里默:《波斯湾、阿曼和阿拉伯半岛中部地名辞典》第 2 卷,加尔各答:政府印务监督办公室 1908 年版。下文简称《地名辞典》。

② 阿诺德·T. 威尔逊爵士:《波斯湾简史:从远古至 20 世纪初》(Sir Arnold T. Wilson, *The Persian Gulf: An Historical Sketch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 1928 年版。下文简称《波斯湾简史》。

识兼有学术性和经验主义的特点,以殖民主义的叙事方式建构了帝国话语下的海湾历史,目的是将英国对海湾的军事远征及殖民统治合理化、道德化。选择的参考资料以孟买档案为主,包括英国在海湾的政治驻扎官和政治代表的报告、英国海军的调查报告,以欧洲旅行家的游记为辅。资料的选择范围注定了著作的欧洲视角。二战后,海湾历史的研究者多为历史学专业学者,研究重点是英国与海湾的关系,研究成果更具学理性。20世纪末以来,受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影响,英国的海湾历史研究试图以海湾阿拉伯人的视角探究英国干预海湾的原因和作用,其结论依旧在为英帝国正名。总体来说,二战后英国对海湾历史的研究一方面肯定了英帝国在维护海湾秩序方面的贡献^①,另一方面将英国对海湾的干预合理化,认为英国对海湾的“保护”源于海湾酋长国的政治传统和经济需要^②。

因此,20世纪各国史学界普遍接受的是英国官方的观点,即18世纪末19世纪初定居在阿拉伯半岛东南沿岸的阿拉伯人是从事劫掠活动的“海湾海盗”^③。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试图驳斥这一观点,用阿拉伯人的视角重塑前殖民地时期海湾阿拉伯人的形象^④。本文以英国对前殖民地时期海湾阿拉伯人的历史书写为研究对象,探讨18、19世纪之交“海湾海盗”问题的叙事方式、历史事实和帝国遗产。

一 英帝国在海湾的殖民扩张

海湾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贸易的主要通道之一,中国、印度等国的货物通过海湾运往波斯和黎凡特,欧洲、阿拉伯和波斯的商品又通过海湾运往东方。近代英国与海湾地区的交往是英帝国扩张的重要环节,海湾地区见证了英帝国从崛起到转型再到衰落的全过程。

第一,1600年之后,在海湾的扩张是英帝国崛起的重要表现。1498年达伽马的船队在阿拉伯水手艾哈迈德·本·马吉德(Ahamd ibn Madjid)的领航下顺利进入印度洋水域。16世纪初,葡萄牙人以霍尔木兹王国为据点,建立了其在整个海湾地区的势力范围,并控制了经由霍尔木兹至巴士拉及海湾其他港口的贸易和运输。都铎王朝时期的大变革使英国成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民族国家,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具备了同西班牙和葡萄牙竞争海外殖民地的实力。17世纪初,波斯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向海湾扩张。1623年,波斯陆军在英军的掩护下渡过海湾,又在英军海上火力的支援下向霍尔木兹发动突袭,最后攻陷了霍尔木兹城。英国东印度公司因此获取了在海湾东侧沿岸的阿巴斯港(Bandar Abbas)建立商业代理机构的权利^⑤。1660年,葡萄牙人撤离马斯喀特,基本上结束了其在海湾的殖民统治。

① 参见J. B. 凯利:《英国和波斯湾(1795—1880)》(J. B. Kelly, *Britain and Persian Gulf, 1795—1880*),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J. B. 凯利:“英国在波斯湾的地位”(J. B. Kelly, “The British position in the Persian Gulf”),《今日世界》(*The World Today*)第20卷第6期(1964年),第119~138页。

② 参见詹姆斯·昂立:“英国和海湾酋长国(1820—1971):保护政治”(James Onley, “Britain and the Gulf Shaikhdoms, 1820—1971: The Politics of Protection”),《社会科学研究网络电子期刊》(*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009年),第1~44页;詹姆斯·昂立:“海湾地区的保护政治:19世纪的阿拉伯统治者和英国驻扎官”(James Onley, “The Politics of Protection in the Gulf: The Arab Rulers and the British Residen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新阿拉伯研究》(*New Arabian Studies*) (2004年1月),第30~92页。

③ 参见J. G. 洛里默:《地名辞典》第1卷;阿诺德T. 威尔逊爵士:《波斯湾简史》;J. B. 凯利:《英国和波斯湾(1795—1880)》;J. B. 凯利:“英国在波斯湾的地位”;詹姆斯·昂立:“英国和海湾酋长国(1820—1971):保护政治”;詹姆斯·昂立:“海湾地区的保护政治:19世纪的阿拉伯统治者和英国驻扎官”。

④ 参见苏尔坦·穆罕默德·卡西米:《海湾阿拉伯海盗的神话》(Sultan Muhammad Al-Qasimi, *The Myth of Arab Piracy in the Gulf*),伦敦:劳特利奇出版公司1986年版;L. E. 斯维特:“海盗还是政治? 18世纪波斯湾抑或阿拉伯湾的阿拉伯社会”(L. E. Sweet, “Pirates or Politics? Arab Societies of the Persian or Arabian Gulf, 18th Century”),《民族史学》(*Ethnohistory*)第11卷第3期(1964年),第262~280页;帕特里夏·瑞安:“跨文化视角下的海盗:18世纪西印度洋和波斯湾区域的海上暴力”(Patricia Risso, “Cross-Cultural Perceptions of Piracy: Maritime Violence in the Western Indian Ocean and Persian Gulf Region during a Long Eighteenth Century”),《世界历史》(*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第12卷第2期(2001年),第293~319页;赛义德·阿苏瓦德:“东方形象与伦理:历史人类学视角下的英帝国与阿拉伯湾(1727—1971)”(El-Sayed El-Aswad, “Oriental Images and Ethics: British Empire and the Arab Gulf (1727—1971): A Perspective from Historical Anthropology”),《人类学》(*Anthropos*)第116期(2021年),第319~330页。

⑤ 唐纳德·霍利著,雅飞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93~94页。

在重商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英帝国通过对殖民地进行贸易垄断来增加本国财富^①。16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伊丽莎白一世授予该公司皇家特许状,使其垄断了英国与印度及周边地区的贸易。最初,东印度公司在海湾地区的商业活动集中在波斯,目的是占领当地市场并在海湾地区建立商业霸权。17世纪20年代,英、荷的东印度公司代表驻扎阿巴斯港后,这里就取代了霍尔木兹成为海湾地区的贸易中转站。17—18世纪,英国在海湾与荷兰、法国进行了长期的竞争,并在七年战争后最终取得了在该地区的商业霸权。1763年,英国根据波斯宫廷的御赐执照在布什尔开设了一个新的贸易站,波斯免除英国进出口商品的关税,还向英国人许诺不允许其他欧洲国家在布什尔建立贸易站。

第二,1800年之后,加强对海湾的控制是英帝国转型的重要表现。美国独立战争后,英国海外政策的基本准则总体上由殖民地扩张转变为扩大其在海上和商业上的优势,以确保大不列颠能够自由地向全世界出售其数量不断增长的工业产品^②。由此,英国开始在整个帝国范围内废除奴隶制度,逐渐放松对殖民地贸易的限制,同时扩大海军优势保证贸易路线的安全,并且在殖民地实行自治政策。与移民殖民地不同,英国不断在印度进行殖民扩张并确立自己的主权。18、19世纪之交,皮特(William Pitt, the Younger)政府将印度视为“帝国最重要的关注对象”^③。随着帝国的重心向东方倾斜,保卫和扩大英属印度领土、保护英国至印度的交通线成为帝国主要的军事任务。英国将海湾视为英属印度的安全边界,同时海湾也是英国通往印度的重要通道。因此,保证海湾水域的安全,建立英国在海湾的海权,推行自由贸易成为1800年之后英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

19世纪之前英国在海湾阿拉伯海岸一侧重点关注少数港口。东印度公司在巴士拉设置贸易站,控制了海湾北部的贸易。同时巴士拉还是英印邮件传递路线上的驿站,是监视法国在海湾活动的观察站^④。马斯喀特位于从海湾到印度和非洲的贸易路线的十字路口,是阿拉伯半岛东南部最大的港口,这使它成为海湾贸易的天然转口港。1793年,以马斯喀特为中心的阿曼苏丹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并拥有该地区最强大的舰队,是英国重点争取的对象。双方于1798年和1800年签订协议形成政治联盟,英国政府开始在马斯喀特派驻政治代表。

彼时,英国甚少关注海湾阿拉伯海岸的其他港口,直至“海盗”问题的出现。18世纪后期,波斯和奥斯曼帝国内外交困,处于地区强国边缘的海湾缺乏强有力政府的有效控制,因而秩序混乱,海上劫掠事件频发。1808年,卡西姆人再次袭击了英国船只,并要求孟买政府进贡。英国由此改变了过去不干涉当地事务的政策,孟买政府和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以维护英国人在海上的威信。1809年,英国第一次远征哈伊马角,当时英军甚至不了解此处海岸线的结构^⑤。1819年,孟买政府决定再次远征卡西姆人。威廉·格兰特·基尔(William Keir Grant)少将奉命率领海陆军摧毁所有的海盗船只以及在哈伊马角的军火库。远征的成果通过1820年“总和平条约”得到巩固。1821年,英印政府建立了一支由5~7艘巡洋舰组成的波斯湾中队(Persian Gulf Squadron)在海湾水域巡逻。1823年,英国在海湾的基什姆岛(Qishm)上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海军基地作为海湾巡洋舰的停泊港。由此,海湾水域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在结束了对卡西姆人的第二次远征后,隶属东印度公司的印度海军在1820—1825年期间对海湾水域进行了第一次严格的勘察。1857—1860年期间,海军军官在海湾勘察的基础上绘制出了海湾的海图,这幅海图成为以后海湾各种海图的基础^⑥。

之后,英国与下海湾酋长国于1835—1853年签订了一系列“海上休战协定”,建构了旨在维护海

① 郭家宏:《论亚当·斯密的帝国思想》,《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第91~92页。

②③ 约翰·霍兰德·罗、阿瑟·帕西维尔·牛顿编:《剑桥英帝国史:英帝国的成长(1783—1870)》(John Holland Rose, Arthur Percival Newto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The Growth of The British Empire, 1783—1870*)第2卷,伦敦:剑桥出版社1961年版,前言,第5页。

④ 穆巴拉克·奥泰比:《卡西姆人和英国对阿拉伯湾的控制》(Mubarak Al-Otobi, *The Qawasim and British Control of the Arabian Gulf*),索尔福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9年,第61页。

⑤ 查尔斯·E.戴维斯:《血红色的阿拉伯旗帜:卡西姆海盗研究(1797—1820)》(Charles E. Davies, *Blood-Red Arab Flag: An Investigation into Qasimi Piracy, 1797—1820*),埃克塞特:埃克塞特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⑥ 唐纳德·霍利:《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第239页。

湾水域和平的“海上休战体系”。1853年,在英国的主持下,海湾酋长们签订了“海上永久休战协定”。协定规定:“自1853年5月4日起,我们(签约酋长)各自的臣属之间完全停止海上敌对行动,我们和我们各自的继承者将永远维持海上休战。”^①签约酋长国在1835—1971年间被西方国家称为“特鲁西尔国家”^②。英国是海上休战协定的担保人,有义务监督并保证协定的实施。同时,英国也是调解部族矛盾的仲裁者,部族受到侵略时不能进行报复,需提交英国在海湾的政治驻扎官或海军军官予以裁决,然后按照规定进行赔偿^③。“休战”是英国主导下海湾阿拉伯部族之间的休战,是海湾阿拉伯人逐渐接受并融入帝国秩序的表现,是进一步建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的关键。英国在1880年、1892年、1899年、1916年分别与巴林、特鲁西尔酋长国(今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签署了“专有权协定”(即“排他协定”)。签约酋长国保证不与英国以外的任何国家签订任何协定或建立联系,成为非正式帝国的一部分。

通过1820年以来一系列条约中签约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关系形成了英国对海湾酋长国的间接殖民统治。海湾的政治驻扎官代表英印政府负责监督条约的执行、处理英国与酋长们之间的关系,被海湾当地人称为“海湾酋长”或海湾的“无冕之王”^④。政治驻扎官之下在海湾多地设置了政治代表,后者利用其在当地的社会影响力负责联络情感并执行条约。英国鲜少直接干预海湾酋长国的内政,但掌握了它们的外交权力并负责酋长国的海上防御。这种殖民统治方式被英帝国主义者和学者称为“保护”政治。

二 英国对18、19世纪之交海湾阿拉伯人的形象建构

英国的海湾历史研究服务于英帝国控制海湾的政治需要,是关于“东方”的帝国话语建构。萨义德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东方学(Orientalism)是一种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位置而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⑤东方学者(Orientalist)是指西方国家中任何教授、书写或研究东方的人,从事的研究领域包括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等。萨义德将东方学者的著作看作是欧洲对遥远地域和民族统治企图的一部分。他们的著作对东方人印象的描述是刻板的,往往认为后者是野蛮的,只懂得使用暴力和强权,因此就只能被统治^⑥。东方学语境下的海湾历史研究是英国的东方学者在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根据海湾与英帝国的关系变化对海湾历史的构建,是英国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英国的海湾历史书写中,前殖民地时期的海湾阿拉伯人与其他非西方人的形象相似:野蛮、暴力,处于文明发展的低级阶段。

自洛里默以来,英国的海湾历史学家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海湾阿拉伯人的定性成为西方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即这一时期阿拉伯半岛东南沿岸的卡西姆人是从事海上劫掠活动的“海湾海盗”。他们得出如此结论的主要依据是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记录和1820年“总和平条约”。条约规定:签约的阿拉伯人永远停止在陆地和海上的劫掠和海盗行为;任何一个阿拉伯人私自以劫掠和海盗的方式而非公认的战争方式袭击过境者,将被视为“人类公敌”^⑦。英国以武力为基础,以条约方式将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海湾水域进行劫掠的海上阿拉伯人定性为“海盗”,是“人类公敌”。

①③ C. U. 艾奇逊:《关于印度与邻国的条约、协议、法令汇编》(C. U. Aitchison, *A Collection of Treaties, Engagements and Sanads Relating to India and Neighbouring Countries*)第7卷,加尔各答:军事出版社1865年版,第259、260页。

② “特鲁西尔国家”英文为 Trucial States,其中 Trucial 来自下海湾阿拉伯酋长在1835年签署的“海上休战协定”(The Maritime Truce)。协定规定:各酋长约束自己从1835年5月21日到当年的11月21日(采珠季)停止海上战争;对各自臣民违反停战约定的行为给予赔偿;遇有侵犯其臣民的行为,不得报复,而应向英国在海湾的政治驻扎官或海军军官报告;英国不干涉阿拉伯人之间的陆地战争,但任何违反休战协定的海上行为都将被视为海盗行为;英国负责监督并采取保证各酋长国遵守休战协定。此后,曾经的“海盗海岸”被西方人称为“特鲁西尔海岸”。

④ 丹尼斯·赖特:《恺加王朝时期波斯的英国人(1787—1921)》(Dennis Wright, *The English Amongst the Persians during the Qajar Period, 1787—1921*),伦敦:海涅曼出版社1977年版,第72页。

⑤ 爱德华·W. 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2页。

⑥ 爱德华·W. 萨义德著,李珉译:《文化与帝国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2页。

⑦ C. U. 艾奇逊:《关于印度与邻国的条约、协议、法令汇编》第7卷,第249页。

海盗活动对于海洋贸易的威胁是致命的,因此在西方文明中一直备受关注。英语单词“pirate”源于希腊词汇“peirates”,约出现于公元前3世纪,意为“进犯者”,泛指地中海诸海岸之间的海上暴力行为^①。罗马时期,古拉丁语“pirata”泛指随意的、不合法的暴力行为。西塞罗将海盗视为“人类公敌”(hostis humani generis),认为其触动了人类的道德底线,罪大恶极^②。近代英国从法律角度逐渐形成了对海盗的定义,即“没有得到主权国家授权的袭击者,在海上施行抢劫的暴力行为者”^③。在西方文化和法律的语境下,海盗行为被解释为:肆意进行海上劫掠的私人暴力行为,具有非政府性、任意性、无视法律和人道主义的特征。因此,同样在海湾进行劫掠活动的阿拉伯船只和法国船只,其活动定性却有不同。前者被称为“海盗”,是“人类公敌”;后者被称为“私掠者”(privateer,指拥有政府授权的海上袭击者),是两国公开战争中的民间力量。英国作为海湾制海权竞争中的胜利者以西方法律的标准对海湾“海盗”行为进行界定,宣示了其在海湾水域的话语权。

英国人笔下前殖民地时期的“海湾海盗”形象最早出现在东印度公司船员的报告中,在洛里默等东方学者研究和编纂海湾历史的过程中这一形象得到系统化阐释。英国东方学者笔下的“海湾海盗”形象有以下特点。

第一,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海湾海盗”主要是指下海湾的卡西姆人^④,他们的主要定居地被称为“海盗海岸”。

英国人将18世纪的海湾西南沿岸(主要在今天的阿联酋境内)称为“海盗海岸”,英国历史学家凯利称定居在这里的部落民“因为海盗身份而声名狼藉”。卡西姆人以“抢劫为业、杀人为乐”,“海盗”是卡西姆人的职业,从事海盗活动是他们能够迅速在海湾地区崛起的主要原因之一^⑤。洛里默将卡西姆人等同于“海盗”,是海湾地区不平静的源头。“卡西姆舰队由一群匪徒操控,他们以海盗活动为生,在海上肆意掠夺。卡西姆人的行为被海湾沿岸的阿拉伯人竞相效仿。”^⑥哈伊马角被视为大型海盗船只的“巢穴”^⑦。在英国人传统的历史观念中,“阿拉伯人对海湾的统治在某些时期就是海盗的统治”^⑧。

18世纪居住在海湾西南沿岸的卡西姆部族以及与其有联盟关系的海上阿拉伯部族被英国人统称为卡西姆人^⑨。卡西姆人是逊尼派穆斯林,于18世纪上半叶从波斯海岸迁至阿拉伯海岸并在下海湾迅速崛起。自萨法维王朝覆灭后,波斯陷入内乱,无力掌控帝国边缘的水域。尤其是1748年纳迪尔·沙阿(Nadir Shah)被刺杀后,波斯与海湾岛屿及沿海的酋长国之间建立的贡赋体系难以维持。在海湾出现权力真空之际,阿拉伯的海上部族卡西姆人通过部族联盟形成海湾地区独立的海上力量,不再是波斯、奥斯曼或阿曼的附属。卡西姆人以哈伊马角为政权中心,在此地建立了防御工事严密、象征酋长权力的堡垒。他们通过血亲关系以及联姻、纳贡等非血亲关系与下海湾诸港口和城镇建立联盟,占据了海湾西南侧二十多个城镇、村庄及陆上的腹地,如沙迦、乌姆盖万、哈姆拉岛、拉姆斯、布哈比尔、阿治曼、沙纳斯、霍尔法克坎和霍尔卡尔巴^⑩。此外,他们还占据了海湾波斯一侧的少数定居点,包括林加、卢夫特、昆克和拉斯阿尔赫提^⑪。因此,卡西姆人在下海湾地区建立了一个由诸多海湾沿岸定居点组成的部族联盟政权。与这些定居点接壤的沙漠是阿拉伯游牧部落的活动区域,卡西姆

① 提姆·特拉弗斯著,李晖译:《海盗史》,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页。

② 巴里·哈特·达布纳:《国际海盜法》(Barry Hart Dubner, *The Law of International Sea Piracy*),海牙:尼伊霍夫出版社1980年版,第43~44页。

③ 爱德华·阿尔伯特·乌兹堡:《沃顿法律词典》(Edward Albert Wartzburg, *Wharton's Law Lexicon*),伦敦:史蒂文斯父子公司1916年第12版,第665页。

④ “Qawasim”是形容词“Qasimi”的名词复数形式,词源是该部落的名称“Qasim”。

⑤ J. B. 凯利:《英国和波斯湾(1795—1880)》,第19页。

⑥ J. G. 洛里默:《地名辞典》第1卷,第633~634页。

⑦⑧⑨ 阿诺德·T. 威尔逊爵士:《波斯湾简史》,第203、195、18~19页。

⑩ 这些地区分别是 Al-Sharjah, Umm Al-Qaiwain, Al-Hamra' Island, Al-Rams, Buhabil, 'Ajman, Shanas, Khor Fakkan, Khor Kalba。

⑪ Linga, Luft, Kunk, Ra's Al-Heti(参见穆巴拉克·奥泰比:《卡西姆人和英国对阿拉伯湾的控制》,第25页)。

人与游牧部落在物资流通和人员往来方面形成了一定的互补关系。

根据东印度公司 19 世纪初的记录,卡西姆人的经济收入主要来自采珠业、渔业和海上贸易,其他资源极度匮乏^①。海湾阿拉伯半岛沿岸的城镇和村庄被山脉、沙漠和海洋包围,陆地面积狭小,自然资源匮乏。海洋是他们最主要的谋生空间,因此海湾阿拉伯的社会经济文化受制于海洋。首先,采珠是海湾阿拉伯居民最重要的财富来源,如果没有采珠业下海湾的众多城镇就不会存在^②。卡西姆人以珍珠船为基本的生产单位,以奴隶和负债的船员为劳动力进行采珠活动。18 世纪之后,海湾阿拉伯人将收集来的珍珠卖给印度人,再由印度的珍珠市场流转至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其次,卡西姆人在海湾水域作为海上承运商从事转口贸易。他们的船只不仅承担了海湾港口与印度、东非之间的部分货运业务,也是海湾大小港口之间的运输队。18 世纪往来于大西洋和印度洋之间的欧洲商船具有吨位大、吃水深的特点^③,只能在海湾的少数大型港口如巴士拉和马斯喀特停泊。海湾阿拉伯人的船只只是体型小、吃水浅、航行速度快的单桅帆船,在海湾的大港口与众多小港口之间为欧洲的大商船转运货物。良好的造船技术和海上航行技术是卡西姆人的生存之本,采珠船在需要的时候能够迅速转变成战船。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卡西姆人通过部落联盟的方式迅速扩大自己的势力,与阿曼等海上竞争对手的暴力冲突也更加频繁。当这种暴力冲突波及英国商船以及受英国保护的商船时,卡西姆人的海上暴力活动就被英国人称为“海盗劫掠”^④。

第二,瓦哈比派的宗教教义为卡西姆人的“海盗”活动“正名”。

英国学者认为,卡西姆人的海上暴力活动受到瓦哈比教义的鼓励,皈依瓦哈比派使卡西姆人的海盗活动更加频繁^⑤。“新的教义为卡西姆部落纵容自己的掠夺习惯找到了合理的解释。”^⑥

1803 年前后,卡西姆人接受了瓦哈比教义,成为瓦哈比政权的附庸,瓦哈比埃米尔以接受进贡的形式分享前者海上战利品的五分之一。瓦哈比教义以真主的唯一完美无缺为基础^⑦,认为只有瓦哈比才是真正的伊斯兰教徒,对异教徒发动圣战是合法的。1816 年,瓦哈比政权的埃米尔阿卜杜拉·本·沙特(Abd Allah b. Su'ud)在写给英国在海湾的政治驻扎官威廉·布鲁斯(William Bruce)的信中如此说:“我承诺所有英国臣民都免受伊斯兰教徒的骚扰,但是埃及人、吉达人(Jeddah)、也门人、布什尔人以及穆卡拉人(Mukalla)、马斯喀特人、巴士拉和伊拉克人以及波斯西南沿岸的阿拉伯人(处于赛义德素丹的统治下)都是瓦哈比派的敌人,无论什么时候遇到他们,我们都将以真主之名与之战斗并抢劫他们的财物。”^⑧

凯利认为,瓦哈比的教义煽动了卡西姆人的海上劫掠活动^⑨。在东印度公司的海事记录中,卡西姆人在接受了瓦哈比教义后,其海上暴力活动的频率大幅度增加^⑩。1808 年,至少有二十个地区的船只遭到阿拉伯“海盗”的劫掠。同年,一艘来自巴士拉的商船被卡西姆人捕获,船上的大部分人员被用一种类似于宗教献祭的方式所杀害^⑪。孟买海军陆战队的军官详细描述了卡西姆人杀害俘虏的仪式:“卡西姆人在一种可怕的、庄严的氛围下杀害他们的俘虏,那是一种地狱般的宗教仪式。卡西姆人捕获一艘船后会用水和熏香对这艘船进行净化仪式,将被俘船员割喉杀害,头颅被悬挂在船舷上缘。他们在战斗中会高喊‘真主至大(Allah akbar)’。”^⑫

1812 年,即英军第一次远征卡西姆人两年后,卡西姆人再次袭击了英国船只。洛里默认为,1814 年后的卡西姆人对瓦哈比教义的信奉已经达到狂热的程度,他们“在海上为所欲为”^⑬。卡西姆人不断扩大他们的活动范围,不仅袭击装载英国军用物资的马斯喀特船只,而且还袭击了美国和法国的船只。当悬挂英国国旗的印度商船再次遭受袭击时,英方要求哈伊马角作出解释。卡西姆人的酋长说,

①③④ L. E. 斯维特:“海盗还是政治? 18 世纪波斯湾亦或阿拉伯湾的阿拉伯社会”,第 273、265、266 页。

②⑧⑩ 查尔斯·E. 戴维斯:《血红色的阿拉伯旗帜:卡西姆海盗研究(1797—1820)》,第 13、134、169~170 页。

⑤⑥⑨⑫ J. B. 凯利:《英国和波斯湾(1795—1880)》,第 106、103、99、111 页。

⑦ 唐纳德·霍利:《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第 132 页。

⑪⑬ J. G. 洛里默:《地名辞典》第 1 卷,第 641、653 页。

他们只答应过尊重基督教徒的生命和财产,并没有答应尊重“崇拜偶像的印度人”的生命和财产^①。卡西姆人的态度使孟买政府决定再次对其采取军事行动。

第三,“海湾海盗”形象的塑造是英国人对他者形象的建构,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叙事方式的特点。

洛里默在其《地名词典》中认为,卡西姆人极为凶狠和残忍,这种品性源于阿拉伯人的本性。卡西姆人在海上常用的作战方式为登船后近距离搏斗^②,被劫掠的船只上的船员和乘客往往无一幸免,或被杀害,或被贩卖为奴,或是被当成人质来索要赎金。英国人将卡西姆人的“海盗”活动归因于“卡西姆部落民掠夺性的本能”,认为正是海湾阿拉伯人这种“暴力的本性”使得他们与英国人达成和平协议之后不久就违约恢复了海上劫掠^③。研究海湾历史的英国史学家延续了东印度公司的记录和洛里默的观点。由此西方史学界将18世纪后期的海湾阿拉伯人塑造成“好斗的、不文明的、劣等的”^④以及“无视法律进行无节制劫掠”^⑤的他者形象。

通过建构卡西姆人的“海湾海盗”形象,英国人将自己塑造成海湾的“保护者”与“和平秩序的创造者和维护者”^⑥。大英帝国出于“仁慈”将海湾的阿拉伯人从卡西姆人的“罪恶占领”中解救了出来^⑦。英国介入海湾的目的是维持这一地区的秩序,践行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海湾的“文明使命”。在“保护者”角色的光环下,英国人将对卡西姆人的军事打击以及对海湾的殖民统治合法化、道德化。凯利曾如此评价不列颠在海湾的贡献:“英国在海湾的地位首先建立在它为海湾做出的牺牲上,英国的牺牲和努力在19世纪为海湾创造了和平、正义和法治的环境,书写了大英帝国历史上的光辉篇章。”^⑧

英国的海湾史学研究是帝国扩张的产物,具有显著的种族主义特征。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对于自身的优越性产生了广泛的信念。“到19世纪中叶,似乎每一个英国人都承认,在本质上白种人优于非白种人。”^⑨这一时期,强调人类本质上的异质成为英国社会的共识。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英国帝国主义情绪高涨的时期,出现了歌颂和支持帝国扩张的帝国主义者,也出现了对帝国主义的多元化解释。种族优越论是众多帝国主义理论的共同点^⑩,它满足了英国大众的心理需求,成为帝国主义者歌颂和服务帝国扩张的意识形态力量。

种族优越论的理论来源之一是19世纪盛行于欧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英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⑪将生存竞争、自然淘汰的生物学理论应用在英国社会和帝国主义的思想框架中^⑫。他们一方面认为世界处于竞争状态,“繁荣和强大的最大化是以牺牲弱者为代价的”^⑬;另一方面认为这种竞争与种族的特性保持一致,白人是先天的优秀种族,在国家和种族的竞争中盎格鲁-撒克逊人更有机会获得胜利。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优越性”表现在他们拥有正义、自由、和平的最高理想,注重法律,能担负起促进人类福祉的使命,并致力于对“劣等”民族的人道主义原则。

从种族优越论的角度解释帝国主义的路径中衍生出了帝国的“文明使命”。以张伯伦为代表的帝

① 唐纳德·霍利:《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第154~155页。

②③ J. G. 洛里默:《地名辞典》第1卷,第639、641页。

④ 赛义德·阿苏瓦德:“东方形象与伦理:历史人类学视角下的英帝国与阿拉伯湾(1727—1971)”,第322页。

⑤ 参见查尔斯·E. 戴维斯:《血红色的阿拉伯旗帜:卡西姆海盗研究(1797—1820)》,第404页。

⑥ 詹姆斯·昂立:“英国和海湾酋长国(1820—1971):保护政治”,第7页。

⑦ 苏尔坦·穆罕默德·卡西米:《海湾阿拉伯海盗的神话》,第14页。

⑧ J. B. 凯利:《英国和波斯湾(1795—1880)》,第837页。

⑨ 洛克萨尼·维勒:《种族的肤色:18世纪英国文化的差异性分类》(Roxann Wheeler, *The Complexion of Race: Categories of Differenc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Culture*),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⑩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英国以种族优越论为依据的帝国主义理论有:吉卜林的神话帝国主义、张伯伦的实用帝国主义、罗得斯的扩张帝国主义等。

⑪ 英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代表人物是:赫伯特·斯宾塞、本杰明·克德、卡尔·皮尔森。

⑫ 钱乘旦主编,张红著:《英帝国史》第6卷《英帝国的危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60~262页。

⑬ 伯纳德·索梅尔:《帝国主义和社会改革:英国社会帝国思想(1895—1914)》,(Bernard Semmel, *Imperialism and Social Reform: English Social-Imperial Thought, 1895—1914*),伦敦:乔治·艾伦与昂温出版有限公司1960年版,第29页。

国主义者认为英国人在非白人殖民地承担着传播文明和促进繁荣的责任：“在这些殖民地，占领的情感被另一种情感所取代——责任的情感……我保证我们的统治一定会，而且已经为他们带来了安全、和平以及相对的繁荣。”^①在“文明使命”的旗帜下，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低等”种族的干涉是为了维护安全和促进和平，继而将白人国家对殖民地的干涉合理并合法化。英国在海湾的“文明使命”在于打击了“海湾海盗”，维护了海湾水域的和平和自由贸易。正如英属印度总督寇松勋爵在1903年第一次访问特鲁西尔海岸时发表的著名演说中所述，“我们把你们从你们邻居的手中拯救了出来，向所有国家的船只开放了这片海域，使他们的和平旗帜能够高高飘扬”^②。

三 “仁慈帝国”话语下的“海盗”叙事

前殖民地时期海湾的“海盗”问题包含了海上劫掠事件以及英国有选择地指认和打击“海盗”。这一问题出现的历史原因融合了海上劫掠事实、英国对海湾本土海上力量的忌惮以及转向自由主义的英帝国控制海湾的需要等多重因素。而英国东方学者对“海湾海盗”形象的系统性建构又包含了作者所处时代的帝国理念和外交政策。

海湾地区的海上劫掠活动由来已久，罗马帝国皇帝图拉真曾经因此派兵远征海湾^③。17世纪以来活跃在海湾的海上劫掠者有：印度人，包括阿曼人、卡西姆人、乌图布人在内的阿拉伯人，以葡萄牙人、法国人为主的欧洲人。18世纪，由于海湾地区缺乏统一而稳定的地区秩序，海上暴力活动更加频繁并成为各方势力争夺港口和掠夺财富的必要手段。在海湾诸多海上势力中，英国人之所以针对卡西姆人并将其塑造成海湾“海盗”，一方面在于卡西姆人确实袭击过英国及受其保护的船只，另一方面是因为卡西姆人是海湾水域中英国人唯一忌惮的一支本土海上力量。

在孟买档案的记载中，1797—181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以及受其保护的商船在海湾频繁遭到阿拉伯人的劫掠。卡西姆人最初表现出了对英国船只的尊重，没有主动劫掠过悬挂有英国国旗的船只。他们的海上暴力活动主要针对马斯喀特人，直至1797年卡西姆人才首次与英国船只发生冲突。该年5月和10月，英国商船巴森号(The Bassein)和巡洋舰毒蛇号(The HCC Viper)遭遇卡西姆人船只的攻击^④。孟买会议员因此将1797年视为海湾海盗问题出现的时间。1804年年底，卡西姆人再次袭击了东印度公司的船只特里默号(Trimmer)和香农号(Shannon)。1805年，英卡双方首次发生正面冲突，英国禁止其在英属印度港口进行贸易活动。1806年，双方达成和解，之后两年在英国的档案记录中海湾水域出现了短暂的和平。1808年年底至1809年年初，阿拉伯半岛南部再次出现了大量的海上袭击案件。1809年5月，一艘载有价值30万卢比(约合3万英镑)货物的英国商船密涅瓦号(Minerva)被劫后，英国于1809年11月至次年1月向卡西姆人的定居地发起了第一次军事远征^⑤。之后的4年里，英国档案中关于海湾海盗的记载陷入沉寂。1814—181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及孟买政府关于海盗的报告数量激增。报告中的海盗活动主要发生在印度西北部海岸而非阿拉伯半岛南部和海湾地区，但报告的记录者通常将这些海盗行为归咎于卡西姆人^⑥。

英国档案中记录的海湾海盗事件有以下特点：首先，1797—1819年间有详细记载的、关于英国船只遭到海上劫掠的事件肇事者都是卡西姆人。其次，英国的海上记录不足以显示海湾阿拉伯人海上活动的全貌。19世纪中期以前英国在下海湾的信息获取途径有限，只是详细记载了与之相关的海上劫掠事件，它们只是海湾海上活动的一角。再次，英国有关海上劫掠事件的记载确有其事但并不客观。海湾水域的海盗事件多发生在每年10月至次年5月的“冬季”月份即非采珠季，符合海上阿拉伯人的活动习惯。但是，英国船员无法辨别不同地区阿拉伯船只之间的差别，对袭击者身份的指认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容易受到殖民地官员决策导向的影响。最后，英国档案记录的内容影响了英帝国在

① 参见钱乘旦主编，张红著：《英帝国史》第6卷《英帝国的危机》，第315页。

②⑤⑥ 查尔斯·E.戴维斯：《血红色的阿拉伯旗帜：卡西姆海盗研究(1797—1820)》，第9、107、108页。

③ 唐纳德·霍利：《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第118页。

④ 苏尔坦·穆罕默德·卡西米：《海湾阿拉伯海盗的神话》，第33~34页。

海湾的政策和行动,也影响了学者对海湾历史的书写,成为海湾阿拉伯人“海盗”形象形成的资料来源头。

英国对卡西姆人海上势力的忌惮也是“海盗”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英国在海湾的长期政策是建立制海权。为此,英国为阿曼提供“保护”使其成为自己的附庸,指责卡西姆人为海盗,并采取打压政策,以削弱其海上实力,原因有以下方面。

第一,19世纪初卡西姆人成为英国人在海湾水域的主要敌对力量。波斯人一直没有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军。纳迪尔·沙阿试图在波斯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以抵制外国贸易公司在海湾日益膨胀的商业势力,但由于政权更迭以及波斯海军过于依赖阿拉伯船员而作罢。巴士拉省作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也并未在海湾发展出独立的海军力量。此时的海湾水域,马斯喀特和卡西姆是最强大的两支本土海上力量。马斯喀特的统治者与英国建立了条约关系,只有卡西姆人是有能力与英国海军对抗的本土海上力量。

18世纪末,卡西姆人借助于混乱的地区局势不断扩充海上力量,令英国人忌惮。根据洛里默的记载,1809年英国对卡西姆人进行远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后者的势力强大到让英国人难以忍受。当时他们拥有63艘大船和813艘中小船只,船员总数接近1.9万^①,如此庞大的舰队规模增加了孟买海军的防御压力。东印度公司将卡西姆人描述为“海盗”,称其对印度洋和邻近水域的所有海上活动构成了严重威胁,以此动员帝国的决策机构出动皇家海军攻击卡西姆人。

第二,卡西姆人接受了瓦哈比教义后将劫掠的对象扩展至受英国保护的商船。瓦哈比派不仅仇视伊斯兰教徒中的非瓦哈比派,也仇视崇拜偶像的印度教徒,即便后者是英国臣民也在卡西姆人的劫掠范围之内。1808年,卡西姆人的谈判代表为海上劫掠的行为辩护时指出,他们袭击和掠夺的一些船只虽然拥有英国颁布的通行证并悬挂了特殊标志,但是这些船只的所有者并非英国人,船员也非基督徒,而是印度教徒及其他不信教者^②。

英国在海湾的扩张计划和宗教上的差异使其与卡西姆人的矛盾难以调解。英国东印度公司将卡西姆人称为“海盗”以动员孟买政府及皇家海军消灭卡西姆人的海上力量。对“海盗”的打击是转型时期的英帝国在海湾建构帝国秩序的重要契机。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帝国从重商主义向自由主义转变,其在海湾的角色由贸易的参与者向“保护者”转变。英帝国不再单纯关注其在海湾的商业利益,保护从英国出发经巴士拉到印度的航道以及航行在海湾的英国商船和英属印度商人,创造和平、开放的贸易环境成为“自由主义帝国”的使命和荣耀。此外,防止法国从西北部入侵印度,独占通往印度的海上路线成为19世纪之后英国在海湾的长期战略。

18世纪下半叶,东印度公司在海湾除了直接参与英国与海湾的贸易外,还逐渐成为海湾贸易的“保护者”。这一转变出现的原因有以下方面。首先,保护商船免受“海盗”劫掠成为东印度公司在18世纪后期的一项重要业务。东印度公司为经过海湾的商船提供海上武力保护,并向受保护的商船收取“领事税”。这项费用成为18世纪后期公司的一项固定收入,很大程度上填补了东印度公司在英国对海湾贸易中产生的亏损^③。其次,19世纪初,英国几乎控制了整个南亚次大陆,保护英印商人在海湾的利益并促进英印与海湾之间的贸易,不仅增加了英国的收入,而且维护了帝国在印度洋的荣誉。18世纪末,东印度公司与海湾之间的贸易处于亏损状态,但印度与海湾之间的贸易不断增长。印度-海湾贸易的主要参与者由东印度公司变成了英属印度的亚美尼亚商人和伊斯兰商人,但英国控制了印度至海湾的航线,贸易所用商船多数为英国船只^④。商船上挂有英国国旗,是帝国荣誉的象征,保护商船免受“海盗”袭击既保证了帝国的航运收入,也维护了帝国的尊严。最后,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从重商主义帝国向“自由主义帝国”过渡。孟买政府于1811年向个体商人开放海湾,东印度

① J. G. 洛里默:《地名辞典》第1卷,第603页。

②③ L. E. 斯维特:“海盗还是政治? 18世纪波斯湾亦或阿拉伯湾的阿拉伯社会”,第275、57页。

④ C. E. 戴维斯:“英国、贸易和海盗:1809—1810年及1819—1820年英国远征哈伊马角”(C. E. Davies, “Britain, Trade and Piracy: The British Expedition Against Ras Al-Khaima of 1809—10 and 1819—20”),查尔斯·E. 戴维斯主编:《阿拉伯湾的全球利益》(Charles E. Davies, ed., *Global Interests in the Arab Gulf*),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2年版,第37—39页。

公司不再垄断海湾的贸易^①。在“文明使命”的激励下,帝国精英认为他们有责任肃清海湾阿拉伯人的海上劫掠活动,为自由贸易创造和平的环境。

经济动机是英国与海湾交往的出发点,而强化对海湾控制的原因主要是英国与法国、海湾阿拉伯人进行政治和军事竞争的结果。英法七年战争从欧洲扩展至海湾,1759年,法国舰队轰炸了东印度公司在阿巴斯的工厂,自此英法在海湾的政治和军事竞争日益激烈。1798年,拿破仑在埃及的远征计划不只是为了占领埃及,而是要利用埃及的地理位置通过红海和海湾进一步向东扩展,最终夺取印度。“政府的计划是令波拿巴指挥海陆军占领埃及,夺取英国人所有的东方领地,摧毁后者在红海的贸易站,并通过打通苏伊士地峡的运河来拓展法国的影响力。”^②除了军事竞争之外,18世纪末法国还从外交方面积极争取马斯喀特,派遣各类代表团访问君士坦丁堡、阿勒颇、巴士拉和德黑兰等关键城市,目的在于扩大法兰西的影响力并搜集情报^③。法国的远征和渗透计划使英国震惊。为了消除法国从西北部入侵印度的可能性,英国加快了控制海湾的步伐。为此,英国于1798年与马斯喀特统治者签订条约,将法国的势力排挤出阿曼,同时英国也失去了对卡西姆政权的耐心。英印政府在19世纪初逐渐放弃了保守的海湾政策,通过军事远征打击“海盗”行为使帝国在海湾的军事存在合理化,并在摧毁卡西姆政权后重构海湾秩序。

18世纪后期,英国在海湾的政策目标是维持英国在当地的海上优势,排斥欧洲其他国家,控制海湾本土的海上力量^④。为此,英国首先积极从外交上争取阿曼。阿曼地处海湾的入海口,既可以保证英国在海湾的优势地位,又可以协助英国排斥法国等其他欧洲国家在该地区的势力。因此,英国人与阿曼签订了双边条约,在军事上形成互助关系^⑤。根据条约,英国有义务协助阿曼打击卡西姆人。卡西姆人是阿曼人最主要的海上竞争对手,驻扎在马斯喀特的英国政治代表在其工作报告中充斥着对卡西姆人的敌意。洛里默根据这些报告总结了18世纪下半叶之后卡西姆人的对外政策:一是在海湾扩大势力范围,二是对抗阿曼伊玛目^⑥。其次,英国从军事上打击敌对的海湾酋长国,迫使其遵从英国在海湾构建的新秩序。海湾酋长国处于地区强权之间,其主权归属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可以成为英国在海湾确立帝国秩序的楔子。1820年之后,英国与各海湾酋长国签订条约的行为明确了后者的独立政治体地位。英国以这些酋长国为立足点,确立了其在海湾地区长期的殖民霸权。

以东印度公司的档案记录为依据,洛里默等英国的东方学者将卡西姆“海盗”的形象系统化并传播成为共识,由此建构了海湾阿拉伯国家近代早期的历史。“海盗”叙事是英帝国的殖民话语建构,目的是赋予英国控制海湾以合理、合法的理由。

1903年,英印总督寇松访问了海湾酋长国,次年在其授意下英印政府开启了《地名辞典》的编纂项目,这部著作被视为“帝国野心的缩影”。寇松于1899—1905年担任英印总督,其间实行了激进的外交政策。为了构筑英印的安全防线,他在印度周边地区执行了“前进政策”。具体措施包括扩大对中国西藏的侵略,强化对阿富汗的控制,正式确立对海湾酋长国的殖民统治关系。

1899年寇松到达印度后,英印政府就海湾的地区形势向英国枢密院印度事务大臣提交了报告,报告详述了俄国、德国、奥斯曼土耳其对海湾的干预。寇松政府认为,俄国是英国在亚洲的主要竞争者,前者不断巩固其在波斯北部的影响力并试图向波斯中南部拓展从而到达海湾,而波斯政府也打算割让海湾的一个港口给俄国。德国对海湾的兴趣也日益浓厚,通过与奥斯曼土耳其政府的特殊关系试图将德国至土耳其的铁路线延长,打通美索不达米亚至海湾的陆上通道。土耳其政府一直想要重新征服海湾,声称拥有科威特的宗主权,干预巴林事务,派遣护卫舰造访波斯沿岸一侧的林加^⑦。法

①④⑥ J. G. 洛里默:《地名辞典》第1卷,第212~213、199~200、632页。

②⑤ 穆巴拉克·奥泰比:《卡西姆人和英国对阿拉伯湾的控制》,第64、67页。

③ 阿诺德·T. 威尔逊爵士:《波斯湾简史》,第190页。

⑦ “英属印度政府提交给枢密院印度事务大臣的报告(1899年9月21日)”(“The Government of Indi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or India in Council”),《关于战争起源的英国文件(1898—1914)》(*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1898—1914*)第4卷,英国外交档案(F. O.),编号:F. O. Persia 615, No. 319。

国在马斯喀特附近修建了煤炭站^①,并允许马斯喀特船只悬挂法国旗帜以躲避英国巡洋舰对贩奴船只的检查。英属印度的安全很大程度上在于英国对海湾的掌控,而这些国家都试图在海湾扩张势力以削弱英国在海湾的优势地位^②。为此,寇松政府提出了消除海湾隐患的策略,即将他国势力排除在海湾之外。

寇松在1903年对海湾酋长们的讲话中认为,打击“海盗”的历史是英国能够排斥其他国家、维持其在海湾至高无上地位的关键,是英国控制海湾的合法性来源。“一百年前,海湾地区几乎每个人都是劫掠者或是海盗,没有一艘船出海时不担心会受到攻击……后来英国政府出面干预……有人会问为什么英国能在海湾行使权力?你们(海湾酋长国)国家和家族的历史及海湾的现状就是答案。近代以来,我们(英国)在他国之前来到海湾水域。我们发现了冲突,创造了秩序。我们的商业和你们的安全都受到了威胁,需要保护……我们不能抹去历史上这无私的一页,必须继续保持这片水域的和平。你们的独立将继续得到维护,英国也必须(在海湾)保持至高无上的地位。”^③因此,为了铭记历史、尊重英国在海湾的特殊地位,英国东方学者按照帝国主义者的意志将打击“海盗”的历史进行了系统化编撰。

“海盗”叙事展现了英帝国对海湾酋长国“仁慈统治”^④的一面。“统治”体现在英国独霸海湾,拥有海湾的制海权,对海湾沿岸阿拉伯酋长国实行间接殖民统治。“仁慈”则体现在这种统治不仅着眼于英国的战略利益,也兼顾了海湾酋长国的安全与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为海湾的自由贸易创造了和平的商业环境。19世纪的英帝国进入了巅峰时代,工业革命创造的强大生产力使新帝国可以通过贸易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优势地位。相比重商主义帝国时期对海外领土的占有欲望,新帝国的扩张理念在于:掌控更为广泛的贸易通道,从而向整个世界拓展贸易。保证贸易通道和印度的安全,成为自由主义帝国政策与战略的基本原则^⑤。因而英帝国在控制了海湾酋长国的海上防卫事务和外交的同时保证了它的相对独立,掌握海湾制海权的同时允许各国在海湾进行“自由贸易”并为其创造“和平”的商业环境。

以“海盗”问题和“海盗”形象建构为缩影,英帝国自1800年以来在海湾的活动展示了新帝国的扩张理念和殖民政策的变化。同时,帝国的殖民活动也影响了海湾酋长国的历史和当下。

四 帝国遗产及海湾阿拉伯人形象的重构

英国通过建构“海盗”形象为其殖民统治海湾提供了合法性理由,塑造了英国在海湾的特殊角色。同时也改变了海湾阿拉伯人的历史发展进程,长期影响着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发展。

打击“海盗”成为英国公开干预海湾的开始,改变了海湾阿拉伯人的历史发展轨道。19世纪初,英国军队的两次军事远征瓦解了卡西姆部族联盟。乌姆盖万、阿治曼、沙迦等所有卡西姆联盟成员的大型船只都被摧毁^⑥。1820年当英国皇家海军从海湾撤退时,海湾沿岸所有的防御工事几乎都被夷为平地。英国驻军撤离哈伊马角时,为保证彻底摧毁卡西姆人的力量,尽数销毁此地仅剩的船只、城墙、塔楼甚至是居民房屋^⑦。哈伊马角的军事力量遭到重创,其部族谢赫无法继续成为部族联盟中“最显赫的酋长”,近代下海湾阿拉伯人也失去了建立统一政权的机会。

为压制卡西姆人,英国在特鲁西尔酋长国之间长期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奠定了现代阿联酋国家

① “索尔兹伯里侯爵给埃德蒙·曼森爵士的信(1899年10月7日)”(“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 to Sir E. Monson”),《关于战争起源的英国文档1898—1914》第1卷,英国外交档案(F.O.),编号:F.O. France 3454, No. 260。

② 尼洛法尔·菲杜斯:“寇松和英国的波斯湾战略”(Neelofar Firdous, “Curzon and British Strategy For The Persian Gulf”),《印度历史学会论文集》(Proceedings of the Indian History Congress)第67卷(2006—2007年),第880页。

③ J. G. 洛里默:《地名辞典》第1卷,第2638—2639页。

④ 普里亚·萨蒂亚:《在阿拉伯的间谍:一战与英国在中东隐秘帝国的文化基础》(Priya Satia, *Spies in Arabia: The Great War and the Cultural Foundations of Britain's Covert Empire in the Middle East*),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⑤ 钱乘旦主编,张本英著:《英帝国史》第5卷《英帝国的巅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26页。

⑥ 唐纳德·霍利:《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第166页。

⑦ 查尔斯·E. 戴维斯:《血红色的阿拉伯旗帜:卡西姆海盗研究(1797—1820)》,第8页。

联邦体制的基础。首先,英国选择扶持卡西姆部族在陆上的竞争对手、阿布扎比的雅斯(Banu Yas)部族。哈伊马角被毁之后,沙迦成为卡西姆人的统治中心。沙迦酋长与阿布扎比酋长长期为争夺特鲁西尔酋长国的最高权力而争斗。卡西姆人的军事力量集中在海上,19世纪20年代初他们的海上力量即便遭到英国的重创却仍比海湾西侧沿岸任何部族的势力都要强大。阿布扎比的优势力量集中在陆地上,英国人认为他们不会威胁其商业利益,因此在双方的争端中往往偏袒阿布扎比,并使它所控制的领土不断得到巩固^①。到19世纪80年代,阿布扎比的酋长在英国的偏袒下成为特鲁西尔酋长中势力最强的那一个^②。其次,英国支持阿治曼、乌姆盖万和哈伊马角的独立以分解卡西姆部族联盟的势力。1830年前后,英国承认了阿治曼酋长国和乌姆盖万酋长的独立,二者均为卡西姆领土上的小酋长国。1869年哈伊马角成为一个独立的酋长国,卡西姆人的势力范围再次被分割。在英国的干涉下,各特鲁西尔酋长国相对平衡的势力范围逐渐形成,这不仅削弱了海湾阿拉伯人的民族力量,同时也使部落主义成为民族独立时阿联酋联邦制国体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这个角度来说,英国的殖民统治强化了阿联酋现代国家建构中的部落因素。

英国以打击“海盗”、维护海湾水域的秩序为名充当了此地的海上警察,在海湾形成了特殊的殖民统治方式即“保护”政治。1820年,英国同阿布扎比、阿治曼、巴林、迪拜、沙迦、乌姆盖万及巴林的部落酋长签订了“停止掠夺和海盗行为的总和平条约”(简称1820年“总和平条约”)。条约涉及的内容主要包括禁止阿拉伯人的海盗活动,红白相间的特殊旗帜是缔约部落及其船只的标志,缔约各部落与英国人和平相处,英国将缔约酋长国的商船纳入英国的贸易圈并给予保护^③。自此,签约酋长国放弃了发动海上战争的权利,英国则承诺保护“友好”国家的船只免受海上攻击。阿拉伯船只的红色旗帜变成了白色边缘包裹下红白相间的旗帜,象征着海湾阿拉伯人被纳入了英帝国的统治秩序范围。

英国在海湾建立起的“保护”政治是一种间接的殖民统治,强化了海湾酋长国的家族统治和君主制度,使这些国家逐渐形成了依赖西方的军事防御格局。在“保护”政治下,一方面英国不干涉酋长国的内政,后者拥有处理内政事务的相对自主权。英国没有占领海湾酋长国的领土,也没有在酋长国内设置殖民政权机构。另一方面,英国通过“海上休战体系”使海湾酋长国向其让渡了海洋主权,通过“专有权协定”把控了这些酋长国的对外交往^④。英国与海湾酋长们签订条约的行为是对后者统治地位的肯定和支持,英国的军事和财政支持成为后者强化对内统治的力量来源。由此,海湾的阿拉伯酋长逐渐脱离部落成员转而依靠家族成员进行统治,统治模式从部落协商向王朝家族转变。

昔日“海盗海岸”上的诸阿拉伯酋长国于1971年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获得民族独立后,阿拉伯学者力图从海湾阿拉伯人的视角解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海湾历史,重塑前殖民地时期海湾阿拉伯人的形象。曾在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留学的沙迦卡西姆人穆罕默德·卡西米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他们在获取了更加广泛的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从道德相对主义的立场质疑英国人在西方文化背景以外的历史环境中使用“海盗”一词描绘海湾阿拉伯人的合理性^⑤。

首先,阿拉伯学者对以洛里默为代表的英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批判。穆罕默德·卡西米认为,虽然洛里默凭借殖民政府公职人员的特殊身份能够查阅大量的政府官方文件,但他的著作却并未因这些权威资料而客观、公正地描述事实。因为洛里默等人为了将英国的殖民扩张活动合理化所引用的材料是具有选择性的,也是未经佐证的。洛里默之后的英国学者如凯利所使用的档案文献与洛里默如出一辙。

其次,海湾两岸的居民只是普通人,从事常规的生产活动。他们数千年来经营着海湾地区的贸易,在海湾水域从事采珠活动。和平是海湾水域的常态,外国人的介入是海湾不平静的根源。18世纪真正的海湾海盗是拉赫曼·本·贾比尔(Rahma b. Jabir),除此之外海湾水域不存在从事海盗职业

① 乌兹·拉比主编,王方、王铁铮译:《变化的中东部落与国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78页。

② 唐纳德·霍利:《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第201~208页。

③ C. U. 艾奇逊:《关于印度与邻国的条约、协议、法令汇编》第7卷,第249~250页。

④ J. G. 洛里默:《地名辞典》,第738~739页。

⑤ 帕特里夏·瑞安:“跨文化视角下的海盗:18世纪西印度洋和波斯湾区域的海上暴力”,第276页。

的阿拉伯人^①。拉赫曼·本·贾比尔是乌图布人,活动在上海湾地区,攻击的对象主要是科威特和巴林的船只。贾比尔是训练有素的职业海盗,因其没有直接对英国船只构成危害而被孟买政府所容忍,英国甚至将贾比尔的一些海盗活动归咎于卡西姆人。

卡西姆人的海上暴力活动是阿拉伯部落的扩张方式,并非英国法制话语下的海盗活动^②。在所有归咎于“卡西姆海盗”的案件中,要么参与者并非卡西姆人,要么是卡西姆人对英国船只挑衅行为的反抗^③。受霍布斯鲍姆的社会盗匪理论的影响,马库斯·雷迪克尔认为,所谓的“海盗”普遍持有一种“平等主义精神”,反抗英帝国的海洋霸权^④。

再次,英国不是海湾的“保护者”而是入侵者,他们干预海湾的目的是统治和剥削海湾阿拉伯人,打击海盗的实质是“炮舰贸易”^⑤。18世纪末英国的海湾政策从宏观上来说建立其在海湾的绝对影响力,控制海湾贸易。穆罕默德·卡西米认为,卡西姆人是英国在海湾贸易中的最大竞争对手。为了挤占阿拉伯人在海湾贸易中的份额,东印度公司将卡西姆人污蔑为“海盗”,以打击海盗为口号动员孟买政府和皇家海军摧毁卡西姆人的海上力量^⑥。英国东印度公司和孟买政府以一些未经证实的报告为由,制定了摧毁卡西姆海盗的政策。此外,为了在海湾建立制海权,孟买政府计划在海湾建立海军基地。卡西姆人占领了海湾水域的关键岛屿,其中包含基什姆岛。英国驻海湾的政治代表约翰·马尔科姆(John Malcolm)和在马斯喀特的政治代表戴维·西顿(David Seton)都极力主张在海湾扩张势力。因此,打击卡西姆人是英国海湾政策的必然选择。

最后,穆罕默德·卡西米认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海湾“海盗”问题出现的原因还在于英国人的傲慢和对阿拉伯人的偏见。英国人自视为海湾水域的主人,不仅为颁发有英国通行证的船只提供武力保护,而且将靠近英国船只的阿拉伯船只视为潜在的敌人。在一些案例中,阿拉伯人的“海盗”活动源起于英国人的挑衅行为。1805年,两艘英国商船——特里默号和香农号遭遇海盗袭击并被劫持^⑦。特里默号船长卡明(Cumming)在报告中详细记录了被劫掠的全过程。卡明船长发现了阿拉伯船只后,在没有受到武力胁迫的情况下就主观臆断他们是海盗并率先鸣枪示意,之后遭到阿拉伯船只的追捕而被劫掠^⑧。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即便阿拉伯人的劫掠行为是事实,但英国人却是这场冲突的诱发者,后者的傲慢和对阿拉伯人的偏见使其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洛里默有选择性地记录了事件的部分真相,影响了英国史学界对海湾历史的书写。

五 结 语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在丧失了北美殖民地之后开始向新帝国转型。新帝国的殖民地政策有两大趋势,一是在帝国范围内实行自由贸易,二是将殖民统治的重点转向东方尤其是印度。海湾作为欧洲至印度的关键通道在此时的战略地位举足轻重。英国既要掌控海湾的制海权以建构印度西北部的安全防线,又要维护海湾水域的治安为自由贸易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因此,向新帝国转型的过程中英国不断加强对海湾的控制和干预。此时,海湾的地区政治也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波斯内乱使海湾水域出现了权力真空,瓦哈比派试图借助卡西姆人的力量在阿拉伯半岛东南部扩张,马斯喀特成为英国平衡海湾本土势力并排斥其他欧洲势力的海上支点。海上阿拉伯部族之间的混战使阿拉伯人在海湾贸易自由化转型过程中丧失了掌控更多印度-海湾贸易份额的机会,也给英国人武力干涉海湾秩序以合法化甚至是道德化的理由。

海盗形象的塑造显示出档案记录和历史书写在帝国扩张中的舆论引导和政策导向性作用,展现了英帝国作为最庞大的殖民帝国其统治方式的灵活性。19世纪初,英国以消灭海盗为借口对唯一能

①③⑤⑥⑧ 苏尔坦·穆罕默德·卡西米:《海湾阿拉伯海盗的神话》,第14、32、28、15~16、43~45页。

② L. E. 斯维特:“海盗还是政治? 18世纪波斯湾亦或阿拉伯湾的阿拉伯社会”,第264页。

④ 马库斯·雷迪克尔:《魔鬼与深蓝色的海:商人水手、海盗和英属美洲海事世界(1700—1750)》(Marcus Rediker, *Between the Devil and the Deep Blue Sea: Merchant Seamen, Pirates and the Anglo-American Maritime World, 1700—1750*),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⑦ J. G. 洛里默:《地名辞典》第1卷,第637页。

对其构成威胁的海上阿拉伯力量发动军事远征。之后英国通过签订条约使海湾阿拉伯酋长国放弃了发动海上战争的权力,并以保护商船和酋长国免受海上袭击为由开始了对后者长达 150 年的殖民统治。以打击海盗活动为起点,英国人称其与海湾酋长国之间的关系为“保护-被保护”的关系。英国人以西方法制文化为标准、以种族主义为视角将卡西姆人塑造成“海盗”,将自己塑造成海湾的“保护者”。被美化的殖民统治关系不仅被海湾阿拉伯人逐渐接受,也成为在战后非殖民化的浪潮下英国坚持驻军海湾的重要说辞。英国在海湾建立的殖民霸权确实维系了相对和平的海上环境,有利于自由贸易的发展,但它同时使海湾阿拉伯酋长国长期孤立 in 阿拉伯世界之外,也使其缺少独立的海上军事力量,海上防御长期依赖西方国家。

帝国话语下的历史书写是殖民统治手段的一种,它同样能够激发被统治者的民族意识。海湾阿拉伯学者通过批判帝国话语下的“海盗”叙事,正在重塑海湾阿拉伯人的民族形象。

收稿日期 2024—10—20

作者黄民兴,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刘雪,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陕西,西安,710712。

“Pirates of the Gulf”: Historical Narration and Image Construction of the Gulf Arabs in the Precolonial Period by Britain

Huang Minxing and Liu Xue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Britain began a systematic academic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Gulf. According to the archiv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he British Orientalists represented by J. G. Lorimer classified Gulf Arabs, especially the Qawasim in the late 18th and early 19th centuries, as “pirates”, and referred to the lower Gulf coast where they settled as “pirate coast”. This view became the mainstream of Gulf history study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British writings about Gulf history in the precolonial times are characterized by policy orientation and racist narration. The image of Gulf “pirates” originated from the maritim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British and Qawasim. On the grounds of wiping out piracy, the British Empire which was turning to liberalism gradually built the “Pax Britannica” in the Gulf. After the military expeditions to “Pirate Coast”, the British Empire began the colonial rule in the Gulf for 150 years in the name of “protection”, which affected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defense structure of modern UAE. Since the 1980s, the views of British scholars have been questioned by Arab scholars, who reconstructed the image of Gulf Arabs in the pre-Trucial era.

Keywords: British Empire; Gulf Arabs; Gulf Pirate; Research on Gulf History

【责任编辑 周祥森】